

大纪元

刘晓：两相对比 中共“新社会”才是黑暗的



“新社会”的人竟对“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合成图片）

更新: 2017-05-07 3:42 AM 标签: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旧社会”](#), [中共谎言](#)

【大纪元2017年05月06日讯】在中共治下的当下中国，问题多多。可以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住买得起的房子，可以上街游行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做人有尊严，没有强拆，学者可以不受政府限制，独立做研究，有福利性质的医院……这一切都成为了中国人的梦想。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不曾在中共“新社会”实现的梦想，却早已在被中共口中的“万恶的旧社会”大致实现。

根据中共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的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的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而中共政府一直藉由媒体、学校等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古代社会缔造的辉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中共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唐宋时期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不妨举一些例子。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比如首都开封和杭州人口就达到了400到500万人口；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法国的巴黎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不到十万人，亚洲另外一个繁华的城市巴格达也不过三十至五十万人。当13世纪的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杭州，不禁感慨它是天上的城市，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此外，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懂得星象的人以及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欧洲造船最为发达的威尼斯人对此感慨万千。

一千年前的中国工匠是世界之宝，精美的瓷器、华丽的丝绸出口世界各国为中国换来了大量金银珠宝。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有了接纳乞丐、孤独老人乃至孤儿的福利机构，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具文明的象征之一。

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80%。

.....

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

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影响了西方的文官制度。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蒙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建立在对神佛的信仰基础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羡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呢？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羡过？

对此，为中共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生活的非常幸福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民国时期享有的自由

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人应有“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迄今都不曾享有这四大自由。那么民国时期呢？不必说现在的台湾，就拿民国政府在大陆时期来看。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北洋政府时期。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而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像中共那样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如“六四”。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到600元，副教授260到400元，讲师200到260元，助教100到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到200元，小学教师22到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到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除了办报纸和出版杂志自由外，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结语

反观中共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不仅将中国的脊梁——知识分子一次次迫害乃至戕害，而且让民众对中共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对于这样恐怖的政权，还是什么都莫说为妙，更遑论办什么报纸，上什么街示威。不少中国人还在中共一遍遍的谎言欺骗下，渐渐接受了中共的逻辑，相信只有中共才能拯救中国。

但事实告诉我的恰恰是相反的：中共才是祸乱中国的根源。五十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原因就在于中共是一个极端利己的利益集团，其不仅把持一切资源，而且中共上下官员的贪腐，已成为常态，这不仅使人民创造的财富急剧流失，而且让当下的中国人还在为买房、看病、上学忧心忡忡。

除此而外，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甚至犯下滔天的活摘器官的罪恶，也使中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社会乱象难以解决。不断增长的维权队伍背后就是一个个冤案。

试问，这样的政权“新”在哪里？这样的政权不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吗？这也就难怪“新社会”的人要对“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

往了。

由上述对比可见，中国人要想拥有“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社会，惟有摒弃中共这个撒谎成性、残暴的、不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权！

责任编辑：高义

推荐 陈丹青：太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政府和国家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

2017-05-07 3:42 AM